

導言

1898年，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在香港開辦聖保祿醫院，至今已是一百二十年。為配合院慶，剛於去年新建的二十四層高B座醫院大樓，在今年這特殊的一年舉行開幕典禮，帶著歲月的軌跡，展開燦爛的新頁。

兩年前，院方委託本研究中心撰寫聖保祿醫院一百二十年的歷史，這可說是一項重大而艱巨的任務。研究團隊細心考察、努力蒐集資料，匯集成書。可幸，我們能夠按計劃進度完成，把成果放在您們的眼前。

聖保祿醫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五十年的歷史事蹟，大部份是有賴儲存在法國聖保祿女修會總部的歷史檔案、以及一些學者根據這些歷史檔案所轉述的著作而來。戰後四十多年間的資料，由於文字紀錄不多，主要依靠曾在醫院服務人士的口述歷史，再參考報章、書刊等二手資料作為對證。當時政府的醫療報告及修會總部妥善保存的記錄，都是很有力的佐證文件。直至1990年後，除了有親身經驗及在職的人士協助，亦有現成的報告作為根據，文字紀錄較多之餘，加上科技的進步，所以蒐集醫院近二十多年間的資料相對容易。

雖然本研究中心受託於院方，但作為學術單位，已盡力從可獲得的資料，以中立、公正的態度，兼顧市民身份、政府政策、個人健康、公眾衛生等不同角度考慮問題，來撰寫這本歷史書。從一開始，我們更有意藉着回顧聖保祿醫院的歷史，去了解香港社會的變化，以及在醫療衛生方面的影響，尤其近一、二十年醫療系統受社會事件及發展的衝擊，坊間作有系統紀錄編寫成書者仍然不多，希望這部份的院史可成為其他研究者有價值的參考資料。

香港的華人社會並非從一開始便接受西方的醫療方法。當時政府的醫療設施也只是著重為歐洲人服務，無意照顧華人。這是一方面為了減省開支，另一方面亦是為了尊重華人文化；因為十九世紀的華人對西方的醫療並沒有太大信心，對醫院的印象是一個開刀做手術的地方，可免則免，一般都習慣向中醫師求診。事實上，市面上的中藥坊及中醫診所甚為普遍，收費廉宜，華人不輕易向西醫求診。

十九世紀末期香港發生瘟疫，政府急於以西方醫療方法處理，防止其擴散、蔓延。華人既然是居民主體，政府不得不關注華人居住環境的衛生情況，以免影響整體居民的健康。政府的醫療衛生政策，直接地促成中西醫療文化在香港的交匯。

在瘟疫發生前的數十年，聖保祿女修會本着傳教和履行仁愛的心意，已在香港灣仔設立了「聖童之家」來接收棄嬰、培育孤兒、照顧老弱殘疾和婦女。瘟疫發生後，修會在1898年，於皇后大道東海傍成立了專為兒童和婦女而設的小型醫院，贈醫施藥。

隨後灣仔地區海傍的填海工程、電車路通車等，使該區日漸繁盛，並興建了很多貨倉、碼頭。聖保祿女修會在灣仔的會院，位於碼頭和貨倉之間，並非一個清靜的環境，也沒有發展的空間。很快地，修女發現唯一的出路是遷往其他地區。

1907年，修女有機會將院舍擴展至跑馬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四年間（1914 - 1918），在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金神父的協助下，修女幸運地售出了灣仔的物業，用來轉購位於銅鑼灣道的棉織漂染廠，並將該建築物改建為三層高的醫院——所以今年既是聖保祿醫院建立的一百二十周年也是遷往銅鑼灣的一百周年。新醫院設有當時先進的手術室，舒適豪華的頭等病房，但同時亦有為貧困病人設立，收費廉宜的普通病房，由十位修女、四位護士提供護理服務。其後在醫院建築群的中央，興建了一座宏偉的教堂，雖然名為「基督君王小堂」，卻可容納一千人。這不僅是修女的靈修中心，更是她們服務的動力之源。

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日治時期（1941-1945），香港人口遞減、食物不足，大部份居民撤離香港，返回國內。留下來的，大都營養不足、疾病頻生。在銅鑼灣，整個聖保祿修會屬下的建築群，曾同時收容了近六百位病人。可謂與香港市民共渡時艱。

二戰後的國共內戰，除了使香港人口迅速回流，還有大量難民湧入，再加上隨之而來的嬰兒潮，這些情況使香港要面對嚴重的公共衛生及醫療需要。但是，香港政府當時的保守政策，沒有追上激增的醫療需要，公營醫院只有到處置放的臨時病床。這時的聖保祿醫院則增設了新翼，專為婦產科使用，同時增加育嬰設施。

政府自1964年起，大約每十年發表一次的醫療報告，顯示了政府有關市民健康的政策，也可以看出香港社會的變化，市民生活質素的改變，更看到公營醫療對私營醫療可以有的疏離或互補關係。

1960年代，香港社會已消化了難民潮的衝擊，並開始發揮難民潛在的勞動力量，醞釀著經濟的繁榮。但1964年的醫療白皮書，卻保守地專注於防治傳染病與提供門診服務這些基本的防範工作。難得1974年的醫療衛生服務白皮書，能夠進取地同時著重對疾病的「治療」和「預防」，將

目標放在保障及促進整體的公眾健康。於是，港府大力發展公營與補助醫院，並分區規劃及管理醫療護理服務。私營醫院無形中被邊緣化，只歸入醫務衛生署的牌照監管系統中。

聖保祿醫院相對於政府醫院和補助醫院來說，在人力與資源上，望塵莫及，唯有在質素上提升。在醫務總監羅理基醫生的倡議下，院方與醫生合組有限公司，引進了香港首部電腦斷層掃描機及其他醫療儀器；又購置電動病床、安裝入牆管道式的氧氣機等設備，大大提高了醫護質素。同時，院方成立了駐院醫生制度來提供二十四小時的普通科門診服務，方便市民，亦使院方能夠在劣勢中，穩定地經營。

1985年有關醫療服務的《司葛報告書》，建議政府成立醫院管理局，接管政府醫院事務署屬下的二十間政府醫院和由其他志願團體營辦的十六所補助醫院，並把兩者統整為「公營醫院」。

由於1990年代初期香港經濟蓬勃，庫房連年有大量盈餘，港府在公營醫療上投放了大量資源，使它們在質、量和科技方面能迅速擴展。結果，市民不論貧富，一面倒地使用公營醫療服務，連醫護人員也不願私人執業或到私營醫院工作。一向在醫療系統邊緣的十二餘家私營醫院，經營變得舉步維艱。

聖保祿醫院作為其中一間私營醫院，在面對這些困境時，採取了一些積極措施。首先削減了病床，以優化住院環境，並增加了病床使用率。其次是引入了更多先進儀器，提高醫療質素。結果，醫院成功地擴展服務範圍及對象，有足夠能力繼續經營。在方心讓醫生協助下，院方參與了由外部醫護人員監察與審核的認證計劃，向公眾展示聖保祿醫院盡心盡力的專業服務。故此，當聖保祿醫院在1998年慶祝成立百年時，已是一間聘用了五百名職員、擁有四百六十三張病床，和多部先進醫療儀器的綜合型醫院。

公私營醫院的關係，可說是互相競爭，也是互相補足。公營醫院應付市民的急需，私營醫院則提供市民比較貼身的服務，遷就市民緊張的作息時間，提供適當的醫療項目。政府亦樂見私營醫療機構的使用率提高，以減低公營醫療系統的開支。

今天，香港醫療服務方面能夠有公私營系統平衡發展的局面，基於很多歷史因素；其中包括1997年底爆發了亞洲金融風暴，影響整體社會的經濟，政府獨力承擔醫療服務的開支，顯得十分吃力。隨後，1999年倡議醫護改革的《哈佛報告書》，建議政府善用公營系統與私營醫院合作，減少公帑開支，以及補足整體醫療服務，並為經濟能力較佳者提供更個人化

的服務和更舒適的住院環境。2008年醫療改革諮詢文件更進一步提出「公私營協作」的醫療概念。在這融洽的形勢下，聖保祿醫院才能先後於2009年及2017年改建A座及B座醫院大樓，作進一步的發展。

其他使公私營醫療系統融洽一致的歷史事件，包括2003年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沙士 SARS）使香港成為疫埠四個月，以及2004年起的八年間，內地產婦來港分娩的熱潮。聖保祿醫院雖然不是一間以產科為主的醫院，當時亦收納了為數不少的產婦，享受一段有豐厚收入的時期。可幸，院方仍堅持為本地產婦提供足夠的服務，不致引發港人更多的不滿。而這段時期，公私營醫療系統的互為依賴，開啟往後更緊密的合作。2008年政府就「公私營協作」計劃而推出的措施，聖保祿醫院亦有受惠，例如：電子病歷互通、放射診斷造影、大腸鏡檢查等。

由於「沙士」疫情的嚴重打擊，強化了市民自購保險的未雨綢繆意識，使私人醫療保險開始普遍。所以，政府近數年醞釀推行自願醫保計劃。當然這是為了減低公帑開支，但它同時將會提高私營醫療機構的使用率。這種公私營醫療的協作，將可以使聖保祿醫院受惠，得到持續發展。

聖保祿醫院雖然不是公營醫院，但仍要向市民交代，因為它從事醫療工作與市民的健康有直接關係。院方有需要滿足病人作為消費者的權益，並且提供先進的醫療科技、透明化的管理。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看到聖保祿醫院自1970年代開始擴建的半個世紀以來，先後成立駐院醫生制度、醫院管治委員會、專科顧問委員會、外部評審、投訴和醫療糾紛處理等機制。可以說是由家庭式的運作與經營，逐漸演進成為一間現代化方式運作的醫院，具專業化的行政管理，醫療服務分門別類，種類繁多。

這一間隸屬國際聖保祿修會的醫院，一方面是私營醫療機構，沒有政府的補貼；另一方面卻懷有為貧苦大眾服務的使命，收費不能太昂貴亦不能以商業原則至上行事。要以自給自足的方式經營，實非易事，而宗教團體主辦的醫院雖然以醫療為主，它的特徵更在於包括對病患者甚至員工們的心靈牧養。

由收養棄嬰到現代化方式運作的醫院，聖保祿修女這個修道團體，主要是為了作出信仰的見證，傳揚福音喜訊的使命。醫療工作雖然牽涉不少財務的安排，為她們卻並非一種商業行為，也從來沒有忘記初衷。不過，修女年齡的老化及後繼乏人，要如何面對時代的轉變，是一個無法逃避的問題。

有位修女認為，聖保祿醫院就是耶穌所說「善心撒瑪利亞人」比喻中的客棧。撒瑪利亞人帶着傷者、放下銀兩，要求傷者得到照顧。經營客棧的人，要了解傷者在路上的遭遇和傷勢，讓他康復，更不能辜負善心人的委托。這是一個雙重的使命。修女們當然很容易看到，那位善心人和那位傷者，就是她們信仰中的基督。

聖保祿醫院一百二十年以來，醫治過無數的病者、傷者；亦有無數捨己為人的醫生、護士、職工，與懷有無私奉獻和實踐基督精神的修女，一起在這裡為香港點亮過一盞「南丁格爾」的明燈。他們值得我們敬仰。

聖保祿醫院在銅鑼灣一百年前原有的建築物快將全部消失，因為醫院舊有的主樓將被拆卸。唯一不會被拆卸的，是醫院建築群的中心——「基督君王小堂」。按照計劃，小堂對開的空地，很快將會建造由兩排樹木圍繞着的花園，直通繁華的銅鑼灣道。這個設計應該是喻意聖保祿醫院對市民的服務，始終是以基督君王為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主任

夏其龍

2018年11月